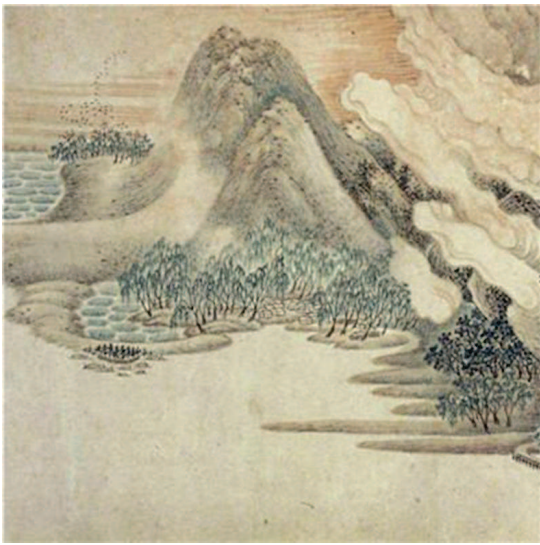


访谈录

◀ （上接 5 版）

术是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这一点我懂，但我起码要知道以前已有什么，才能把现在的区别开来。一些现代艺术家(我很小心地用这个词)出生在中国，但不喜欢被贴上“中国艺术家”标签。这一点我也懂，并且能理解当他们的作品不被关于中国艺术的保守观念所束缚时，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我们有多少不同的方式去给类似的“大词”(enormous terms)下定义，我们或多或少都无法回避以历史和社会作为参照。



吴彬《山阴道上图》(细部)

把艺术看作其他什么的复制品,或者纠结一件艺术品也许不是彻头彻尾的原作,是西方柏拉图式的焦虑症

**文汇报：**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唐史研究专家麦大维 (David McMullen) 教授。在剑桥的求学经历如何塑造了您的学术理念和路径？

**莫欧礼：**我在剑桥做研究和写作博士论文是30年多前的事情了。今天的中国与1982年我初次接触的中国已大不一样。这些变化影响了我如何看待中国的过去和现状，也影响了我理解中国作家、思想家、电视和网络上的流行文化生产者，对他们自身与中国过去和现状的关系的表述。我在剑桥的岁月并不决定我的观念和兴趣，但它的确训练我在进行研究时采取更可靠的方法。

我在剑桥接受的博士训练很传统，它强调语文学和阐释学能力。我们在博士项目临近末尾时才开始讨论文写作。其实很难说当时有类似博士项目的东西,都是很旧式的,我想这一套如今已经改革了。不过我并非没有感激之情。我接受了高强度的文言文阅读训练，这种训练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还教会了我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阅读：不仅仅是去理解一个作者(无论他是否在世)说了什么，而是思考文本在各个方面都意味着什么，它也许与作者的直接意图并无关系。

我有几位非常杰出的老师，麦大维教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他对唐代的知识在西方学界出类拔萃。他和其他同事令当时的我思考文本的政治属性。在每个社会,作者都要

根据潜在的听众来构拟意见、表达主张，不是完全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么简单。有时他们其实不相信自己说的，有时他们不得不说那些话，有时他们口头上赞同，但行动上逆其道行之。历史和人文专业的研究者都需要这种阅读训练。此外，精确又不乏想象力的阅读，且用第二外语来阅读，意味着你对材料的掌控，这会帮助你建立起对研究对象的洞察力。

我在剑桥的老师也很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很有帮助，这也是我以前没怎么关注过的领域。最大的收获是一个简单的对照。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要寻找最原始的文本，或者试图把被污染的(corrupted)文本恢复到他们认为本是初的状态。例如莎士比亚研究者热衷制造最初版的《哈姆雷特》，他们争相比拼，直到某一版最后“胜出”。接受中国学术训练的学者同样关注文本的真实性，研究方法同样老练，但总体的态度会更为宽容。他们会更平和地接受一个事实：文本通过不同的路径得到传播，最终一个文本会存在不同版本。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念头一定要寻找白居易某首诗的唯一真实版本。文本的变异被视为一种自我丰富的过程。

把艺术看作其他什么的复制品，或者纠结一件艺术品也许不是彻头彻尾的原作，是西方柏拉图式的焦虑症。王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王履绘制第二套华山图册，是他表达自己对创造力理解的核心。他把绘画、写作(和思考)放在同等高度。很多西方画家也会就一个图像创造多幅作品，可是在19世纪现代主义到来之前，极少有人说出这么做的理由，来主张艺术实践可以就一个主题不断重复。与之类似，中国复制书画的历史悠久，但西方复制书画的历史仍有待认知。

剑桥教会我要尊重文献和文献研究。我很佩服中国学者

对文本文献的精通，更不要说民族志和考古学方面的文献了。出色的文献研究无疑可以避免过度简化历史。比如，我不太赞同过多使用晚唐才出现的新儒家话语来阐释中国历史，也不明白为何大学的中国宗教课程只着重讲“三教”，却忽略从中脱胎而生的民间宗教。再如，我们只有把“文武”当作对等的二元，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中国文化崇文抑武的想象中。的确,传统的解读都强调“文”的重要性，但现实却往往并非一边倒。

**文汇报：**您的博士论文2004年由博睿出版社 (Brill)出版,书名为《中国唐代的官僚任用仪式:读王定保〈唐摭言〉中的岁考》。这本书透过《唐摭言》观察唐代科举文化，尤其是一系列科举仪式。这些仪式在唐代有怎样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

**莫欧礼：**中国通过科举任用官僚，是中国政治和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即使在唐代科举诞生初期，它也是一个会淘汰大部分考生的制度。这样一个制度注定会激发怨恨和嫉妒，但同时会促进对国家的忠诚。一个制度如果能让大多数参与者反复失败，且同时能增进忠诚意识，那它不啻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治理手段。

几方面的原因强化了这个制度。首先,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上层贵族都想建立一套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与教化、改良和文学有关的价值，这些都可以用“文”这个核心词加以浓缩概括。科举仪式成为这些理想价值的一种外化表演。我们通常觉得唐代文化是开放的和国际化的,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它也是高度保守和怀旧的。许多著名唐代政治理想阐述对汉代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推崇,常把唐代的法制、礼制、学术体制、官僚体制与汉代甚至周代进行对比。考虑到这样的对比

常常用来革新机构和政府制度，这种保守主义其实具有创造性。尽管这些阐述不一定没有分歧，它们仍可以仰仗一个共同的传统,我之前称之为“大传统”。参加科举仪式的人会想象他们参加的活动是与过去有关联的，这使他们当下的政治活动获得合法性。他们就同一个题目撰写考试答案，他们的价值，以及他们实践仪式的行动本身，都逐步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可见的部分，这种公共文化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接下来的时代仍持续存在。

宋代以降，科举的规模逐步扩大，科举仪式的社会和政治意涵随之产生变化。失利者的队伍扩大了，乃至时而有骚乱的举子放火烧掉衙门。然而这套制度延续了下来。精英治国的理想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关键,当然,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但包括科举仪式在内的众多文化活动仍维系着这种理想。国家、个人、家族都从科举获利。试想有多少新科举子及第后缔结了新的婚姻？科举调节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每个地方社会都有当地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名门望族。科举在民族学上的重要性更显示出它多文化融合的特点。有多少穆斯林学者参加了明代科举并获得成功？这种民族和宗教融入在唐代就有先例，一些韩国士子参加了唐代科举考试,甚至有说法(尽管可信度不高)说一位波斯举子也参加过。

一个有待更充分研究的方向是科举文化的通俗表现。从明代开始，科举遍及物质文化生产的诸多方面,比如刺绣、铜镜和瓷碗等,上面经常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这样的吉利话。赌博游戏也从科举中汲取灵感，我在中国的集市上买到过状元筹、升官图等游戏。市场上肯定有很多假货,即便如此，这些游戏都是很有趣的现象，它们显示出人们一度关心的是什麼。中国早期的报纸,如《申报》《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白话画图日报》等,都刊登引人入胜的科举速报。举个例子，《湘报》刊登了一则新闻,1891年在广州的考场上抓住了两名枪替，事后他们的照片被贴在文场(考试院)里示众。这是个很特殊的例子，把我过去和现在的研究兴趣都勾连起来了。

**文汇报：**您的书中提出唐代科举取士的仪式重心由官方逐渐转向私人。您认为这一转变的根源是什么？

**莫欧礼：**我或许过分夸大了这种转变，但我仍认为考官和举子的个人作用是逐渐加强的。有些私人的小型仪式或许

早有雏形,只是没有人注意,而应试人参加的国家组织的大型仪式(比如“朝见”)则研究多多。初唐经历了一个快速中央集权化过程,但唐代在前150年里推进中央集权尚且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整个300年的时间跨度了。随着中央的权力衰落，老牌学者和政治家开始越发倚靠自己的资源，他们在公开和私下都有密切往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察觉到自己对重建官僚精英群体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这是科举体制最不可思议的一面：那些为国家取士制度效劳的人，能把持这个制度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可以为自己谋取社会和政治利益。

从较长时间段来看，科举仪式空间大小的变化导致其重要性起起落落。开封比长安小得多，什么仪式场所能容纳上千名乡贡就成为一大挑战。宋代的仪式规模普遍较小，这一点能具象地看出来。比如,比较唐宋帝陵的话，河南的宋帝陵比西安北边的关中唐十八陵占地面积要小得多。宋代的政府仪式大幅削减，而唐代常以这方面的巨额开支著称。此后又为之一变,金、元、明、清的政治家们热衷于回望唐代，这些朝代都城规模不断增大，为政府体系不断增员提供了空间。

过去两年，我加入了一个国际团队，把吴兢的《贞观政要》翻译成英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明年能问世。很显然，吴兢编这部书的原因是他担心玄宗不能像太宗在一百年前时那样高度集权地统治国家。他对太宗的推崇也许并不符实，但他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这很重要。不过,像吴兢这样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一定思考过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央集权究竟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非常规的,我不认为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地理实体层面上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科举仪式，还是其他形式的政府活动,或社会生活,组织机构由大变小,都不奇怪。

